

令狐楚年譜

令狐綯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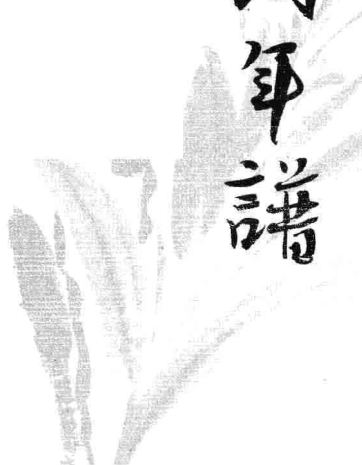
尹楚兵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尹楚兵 著

令狐楚年譜
令狐綯年譜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令狐楚年谱 令狐绹年谱 / 尹楚兵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325-5031-9

I.令… II.尹… III.①令狐楚(766或768~837)——年谱②令狐绹——年谱 IV.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95170号

责任编辑: 杨万里

令狐楚年谱 令狐绹年谱

尹楚兵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2.875 插页 3 字数 300,000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5031-9

I·2040 定价: 38.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郝贤皓

尹楚兵君 1988 年从湖南师大中文系本科毕业后,考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随我攻读硕士学位。三年后他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令狐楚年谱》,约有十二、三万字。因答辩论文打印稿为篇幅所限,最后截取年谱的前半部分,以《令狐楚大历至长庆事迹系年考辨》(《令狐楚年谱》上)为题提交专家评议和答辩,论文得到了同行专家和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

楚兵君取得硕士学位后,就留在南京师大工作,1994 年又在职考取博士研究生,继续随我攻读隋唐五代文学,而研究方向由中唐转为唐末五代,《令狐楚年谱》也因种种原因搁置下来,未能及时整理出版。在后来的十余年间,楚兵君并没有放弃对令狐楚的研究,先后在《文献》、《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关令狐楚生平、交游及其作品的研究论文,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在,终于看到这本年谱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作为他的导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当然,摆在眼前的这部《令狐楚年谱 令狐绹年谱》,已在硕士论文《令狐楚年谱》的基础上不断地修改补充,研究范围也由令狐楚延伸至其子令狐绹,所以征引材料的丰富,考订的精审,都已远远地超出了当年的硕士论文。

读了这部书稿,我有如下几点感想:

首先,令狐楚、令狐绹父子在唐代政治和文学方面都是具有很大影响的人物,令狐楚是中唐重要的政治人物,与当时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又是著名的骈文家和诗人,令狐绹则是牛党后期的领袖人物,父子俩与当时文坛名家都交游甚密。但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令狐父子缺乏应有的重视,未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少数几篇有关其生平和创作的研究文章,也只是一鳞半爪,难以窥其全貌,古代典籍的记载及时人的研究亦多疏误。尹楚兵博士的这本《令狐楚年谱 令狐绹年谱》,广征旁搜史料,对令狐楚、令狐绹父子的家世、籍贯、仕宦、交游、政治活动、文学创作(包括诗文编年和辨伪)、生平著述等作了详尽的考证和辨析,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令狐楚父子最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填补了学术界的一个空白点,因而具有开创之功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其次,本年谱在体例安排方面比较科学合理。谱中每年之下先录时事,以见当时之政治背景、朝廷重要人事之变迁、交游之行事等;次列谱文,详列谱主本年之仕宦、交游与政治活动;然后征引考证资料,以明结论所据;对于史籍记载及今人论著有误或歧异者,则作“辨正”、“考异”;与谱主相关的遗闻逸事,以“附录”形式附于其后;最后为诗文编年。这种体例编排方式,显然经过作者精心的考虑,对于令狐楚父子这种政治、文学上兼具影响而其本身的史料又错综复杂的谱主而言,无疑是最为恰当的。

再次,本书最重要的特点是征引材料之丰富,考辨之精审。

楚兵君从事古代文史研究已有二十年,以文献考订见长,曾发表过不少这方面的高水平论文,而从这本书中更能看出他在这方面的功力。

学术研究尤其是撰写年谱一类著作,离不开材料的发掘和

搜集。从本书征引的材料来看,包括总集、别集、史书、笔记、类书、金石、方志、中外书目、诗话、文论、年谱、今人论著等,足见范围之广、作者搜罗之勤。书中还充分利用了最新发掘出来的材料,如近几年出版的《全唐文补遗》、《全唐文补编》等总集,最近数年披露的唐代墓志(如《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狄兼谟墓志》等),以及新近发表出版的相关论著等。楚兵君对所征引的材料并不盲从,非常注重对史料的真伪及版本差异的甄别。

书中钩微抉隐,考证细密,颇多发明,纠正前人及时贤的疏误,亦复不少。如李商隐《白云夫旧居》诗,自清人徐树谷、冯浩以来,均谓“白云夫”即指令狐楚,认为诗歌抒发的乃是诗人因识令狐楚而致后来被卷入牛李党争漩涡以致身世坎坷的感慨之词,楚兵君则参照李商隐的另一首描写“白云夫”的佚诗《访白云山人》,认为“白云夫”实为一隐逸之士,所谓诗歌寄意令狐者,皆为穿凿附会之说。又如令狐楚父子的籍贯,一直存在敦煌、华原、咸阳、太原四种说法,未有定论,本书经过缜密考辨,提出咸阳应为令狐楚籍贯,敦煌乃其郡望,太原系楚父随官居家之地,华原说乃受两《唐书》本传云楚为令狐德棻后裔之误导。证据确实,令人信服。又如宋人钱易《南部新书》卷壬记载:“贞元中,仕进道塞,奏请难行,东省数月闭门,南台唯一御史。令狐楚为桂府白身判官,七、八年奏官不下。”这则材料常被后人引用,作为德宗贞元时铨选制度不能正常运行的一个重要依据,却从未有人对其中作为例证的令狐楚事迹的真伪进行甄别。本书“贞元八年”下经过考证,认为其中所载令狐楚在桂府任职的情况均误,楚在桂府前后只有一年余,非七、八年,所任为掌书记,非判官,其时已释褐为试弘文馆校书郎,亦非白身。既然作为例证的令狐楚事迹皆伪,那么这则材料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书中还有对令狐楚太原幕府任职时间及楚为右拾遗、太常博士、礼

部员外、刑部员外时间的考定；对令狐楚与刘禹锡两人唱和的《彭阳唱和集》编纂过程及其交游情况的考证；对令狐楚贬衡州后官职迁徙的考辨；对《全唐文》中令狐楚伪作的甄辨；对令狐绹由湖州内召为考功郎中、知制诰时间的考证；“大中三年”下对狄兼谟卒年及令狐绹撰《狄兼谟墓志》时间的考证；“大中十一年”下对《孙简墓志》作者应为令狐绹及撰志时间的考证；“大中十三年”下对令狐绹罢相时间及出镇河中时检校官职的考定；“咸通十年”下对绹罢镇淮南后迁授新职时间的考定等等；皆有详实的考证，且颇多创见。书中有异录异，有疑存疑，不强作论断，“识此待考”、“存疑待决”、“并录以俟考定”等，充分表现出楚兵君治学态度之严谨审慎。

在缜密考证的基础上，本书对令狐楚、令狐绹父子一生作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揭示了一些政治事件的幕后真相。如对令狐楚的党属问题，书中通过对令狐楚生平、交游的考述，指出长期以来学术界视令狐楚为牛党的传统说法并不可信，又认为令狐楚亦非李逢吉党，提出了令狐楚无党说；又如谱中对穆宗朝令狐楚被贬原因的分析，认为除了令狐楚职奉山陵、约束不严、致使下属贪赃枉法等直接原因外，还隐藏着一些不为人注意的幕后原因，比如元稹的公报私怨，以及令狐楚原为宪宗宠信之旧臣，又曾依附皇甫镈，而皇甫镈又是欲立澧王为帝的宦官吐突承璀的党羽，因而在吐突承璀、皇甫镈先后为穆宗所杀所贬后，令狐楚为新君穆宗所弃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此外，“大中元年”下辨旧史载白敏中、令狐绹会昌中李德裕“不以朋党疑之，置之台阁”之不可信；“大中二年”下辨令狐绹《李德裕崖州司户制》中所指斥李德裕罪状并非全系捏造；“咸通四年”下指出后世修史者人为地带着党争眼光来看待中晚唐史实也是造成牛李党争史料真伪互见的一个重要原因等等，也都富有新意。

总之,尹楚兵博士的《令狐楚年谱 令狐绹年谱》,对令狐楚、令狐绹父子生平、创作进行了详赡严谨的考证研究,提出了不少具有学术价值的论点,为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依据。

值此楚兵博士的著作即将出版之际,略缀数语,聊以为序。

二〇〇八年三月于金陵寓所

前 言

傅璇琮先生在《李德裕年谱》序中曾对中晚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过一段颇为精辟的揭示：“中晚唐的文学与初唐、盛唐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初盛唐时期的作家，尽管在他们的作品中也表达了他们的政治理想，……但那时的作家，真正卷入当时重要的政治斗争的，却很少；中晚唐不同，不少作家本身就往往是政治斗争的一员，也有些则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现实政治的波涉，他们的作品直接反映了这些斗争，或者带上了他那一时代所特有的政治斗争的色彩。”^①

令狐楚就是中晚唐时期的这样一位作家。他本身即是当时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的一生与中晚唐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如二王八司马事件、淮西用兵、牛李党争、甘露事变等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二王八司马事件中，他曾代府主河东节度使严绶秉承宦官意图，起草逼迫顺宗内禅的《请皇太子监国表》、《上皇太子笺》及《贺皇太子知军国表》、《贺皇太子知军国笺》、贺宪宗登极表等一系列表奏；元和年间用兵淮西，令狐楚依附李逢吉，借起草裴度彰义军节度使制书之机，反对用兵，直接参与了李逢吉与裴度之间的斗争；发生在文宗朝的甘露之变，作为老臣，事变发生后，令狐楚即被召入禁中议事，楚不满

^① 傅璇琮《李德裕年谱》序，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页。

宦官屠戮朝臣、滥杀无辜，同情王涯等人之举，敢于仗义执言，为王涯等人鸣不平，在起草《诛王涯等人制》时叙其罪状浮泛，为宦官仇士良所忌恨，失去了即将到手的相位，后又奏请收敛王涯等人遗骨，并以政在宦竖，不愿同流合污，数上疏辞位，求为外任，即使是在临终前所草遗表中，仍劝谏文宗对甘露事变受害者昭雪降恩；做史家、学者往往将令狐楚与中晚唐的牛李党争联系起来。《旧唐书》本传史臣评曰：“如能蹈道匪躬，中立无党，则其善尽矣。”明确认为令狐楚有党。且长期以来均视其为牛党，如《旧唐书·李商隐传》云：“（李）德裕与李宗闵、杨嗣复、令狐楚大相仇怨。”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也说：“（令狐）楚、绹父子继世宰相，尤为牛党之中坚。”王炎平先生《牛李党争》亦将令狐楚列为牛党的骨干成员。

除与中晚唐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外，令狐楚还是一位颇具吏才、富有治绩的政治家。他一生仕宦，大部分时间都是出任地方大员，长于抚理，施行仁政，所至之处，均有政绩。赴任河阳节度时，前任率河阳兵士三千赴镇，士卒半道叛归，将为乱，楚闻讯亲往慰抚，乱兵遂定。《旧唐书》本传：“汴军素骄，累逐主帅，前后韩弘兄弟率以峻法绳之，人皆偷生，未能革志。楚长于抚理，……及莅汴州，解其酷法，以仁惠为治，去其太甚，军民咸悦，翕然从化，后竟为善地。”后又先后担任天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都值连年旱灾，楚均富济贫，绥抚有方，民乐其惠化，境内晏然。甘露事变后，令狐楚以左仆射兼诸道盐铁转运榷茶使，顺应民意，革除弊政，奏废榷茶使，罢榷茶法。楚为官还以清廉自守，新、旧《唐书》本传载：“始汴、郟帅每至，以州钱二百万入私藏，楚独辞不取”、“以其羨财治廨舍数百间”。令狐楚这种种政绩，或载诸史籍，或见

诸时人诗歌。

令狐楚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同时也是唐代文学史上颇具影响的骈文家和诗人，在当有“一代文宗”（《旧唐书·元稹传》）之称。他的骈文以章奏见长，风格自然流畅，为同时代人所称赏，“每一篇成，人皆传讽”（《新唐书》本传）。清人孙梅《四六丛话》对令狐楚骈文评价极高：“详观文公（令狐楚谥号文）所作，以意为骨，以气为用，以笔力驰骋出入，殆脱尽裁对隶事之迹，文之深于情者也。滔滔亶亶，一往清婉，而又非宋时一种空腐之谈，尽失骈俪真面者所可藉口。由其万卷填胸，超然不滞，此玉溪生毕生服膺，欲从末由者。吾于有唐作家集大成者，得三家焉：于燕公极其厚，于柳州致其精，于文公仰其高。”据新、旧《唐书·李商隐传》记载，晚唐著名文学家李商隐年轻时本攻古文，在令狐楚幕府，从楚改习骈体，后来成为唐代骈文大家。除骈体章奏外，令狐楚亦工于诗歌。其诗长于近体，尤以绝句见称，所作绝句，唐时曾与王涯、张仲素之作合编为《元和三舍人集》（今存残本）。题材上以边塞诗著称。前人评其诗风格“宏毅阔远，与灞桥驴子上所得者异矣”（吴师道《吴礼部诗话》引时天彝书《唐百家诗选》卷一三后评语）。历代重要诗文总集、选本如《文苑英华》、《乐府诗集》、《万首唐人绝句》、《千家诗》、黄生《唐诗摘抄》、徐增《说唐诗详解》、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王志坚《四六法海》、王先谦《骈文类纂》、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等均选录或选评其诗文。令狐楚原有诗文一百三十卷，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二云：“唐集篇帙多者，无若令狐楚一百三十卷、王起一百二十卷、元稹一百卷。”可算得上是唐代的一位高产作家。《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存其诗六十四首、残诗四首（剔除伪作五首，实际存诗五十九首，残诗四首），《全唐文》存其文五卷，一百四十二篇（剔除伪作四篇，实为一百三十

八篇),吴钢先生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一辑)、陈尚君先生《全唐文补编》又辑其佚文九篇。另编有《御览诗》一卷,为现存唐人选唐诗数种之一。

除在诗文方面取得以上成就外,令狐楚与当时文坛亦颇多联系,当时名家如张籍、姚合、白居易、元稹、杨巨源、贾岛、张祜等人都与其交游甚密,楚与刘禹锡、李商隐之交谊更是为人所熟知。在交游者中,与刘禹锡、李逢吉、僧广宣等人并曾有唱和集传世。

相比于令狐楚,其子令狐绹当时不以文学著称,虽曾有文集传世,存世作品却甚少,《全唐文》载其文三篇,《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全唐文补编》及赵振华、何汉儒《唐狄兼谟墓志研究》^①辑其佚文六篇,《全唐诗》载诗一首,系伪作。虽然令狐绹不以文学著称,却与其父一样,与当时文人(如李商隐、温庭筠、罗隐、李群玉、李远、赵嘏等)有着广泛的交往,特别是与李商隐、温庭筠的关系,历来为人所关注。令狐绹与政治的关系较其父更为密切,在唐代历史上,令狐绹主要是一位政治人物,他在宣宗朝担任宰相长达十年之久,特别是作为牛党后期领袖,在牛李党争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故北宋马永锡(一作易)《元和朋党录》一书即以绹之去位作为牛李党争的终结。《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二上“杂史类”：“《元和朋党录》一卷，右唐马永易记牛李朋党始末，自牛僧孺试贤良，迄令狐绹去位。”《直斋书录解題》卷五“杂史类”：“《元和录》三卷，池州石埭县尉维扬马永锡明叟撰，自元和三年牛李对策，以至大中十三年令狐绹罢相，唐朋党本末具矣。”因此，可以说令狐绹是研究牛李党争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① 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作为唐代政治和文学上都颇为重要的人物,长期以来令狐楚、令狐绹父子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其生平,学界或仅把他们作为李商隐、刘禹锡、温庭筠等其他作家的交游来研究,或只是在研究牛李党争的著作或所撰牛李党人的年谱中简单涉及,专门研究其生平的,仅有姜剑云《有关令狐楚的几点考辨》及其所撰仅数千字的《令狐楚年谱简编》、杨晓霁《令狐楚简论》、尹楚兵《唐五代作家考辨二题》“令狐楚里籍考辨”、杨志玖《令狐绹的生卒年》、李发良《令狐绹任凤翔节度使补证》寥寥数篇论文。对令狐楚的文学成就,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缺乏认识,文学史往往仅是在谈到李商隐时才有片言只语论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这种情况略有改观,一是出现了几篇对令狐楚创作进行梳理和评价的论文,如下孝萱先生《〈彭阳唱和集〉复原》、陶敏先生《〈全唐诗〉令狐楚卷及李逢吉诗整理刍议》、姜剑云《令狐楚作品传流及散佚考述》、尹楚兵《〈全唐文〉令狐楚卷订讹》、杨晓霁《令狐楚简论》,另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尹占华、杨晓霁先生整理的《令狐楚集》,吴庚舜、董乃斌先生主编的《唐代文学史》,罗宗祥、郝世峰先生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等也有了令狐楚的一席之地。

但总的说来,有关令狐楚、令狐绹的研究,无论是对其生平还是创作,尚缺乏较为详尽深入的研究,古籍载述与时人论著亦尚多疏误。本年谱在前贤和时人研究基础上,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一、详细考察了谱主的家世、籍贯。

书中对谱主世系作了详细的考证排比,对其兄弟子嗣的仕宦亦作出了较为清楚的考述,纠正了《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两《唐书》本传及相关著述中的一些错误记载。书中特别对众说分歧的谱主的籍贯首次作出了准确清晰的考定。

令狐父子籍贯,迄今为止有敦煌、华原、咸阳、太原四说。本谱通过对令狐楚至交刘禹锡诗文及相关材料的考证,指出令狐楚父子应为京兆府咸阳人,其他三说中敦煌为其郡望,太原系楚父随官居家之地,华原则受两《唐书》本传云楚为令狐德棻后裔之误导。

二、重点考察了谱主一生的科第、仕宦、政治活动及交游。

中晚唐尤其是晚唐,由于遭遇唐末五代战乱,文献大量阙如,现存史料也往往颇多歧异,真伪互见。本谱广征旁搜,钩微抉隐,对谱主一生的科第、仕宦、交游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考证,特别是对谱主仕宦交游中旧史阙载或载述不详及后人考订有误的部分作了重点考证。

令狐楚、令狐绹作为中晚唐重要的政治人物,本谱还尝试将其置于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大背景下来考察他们一生的政治活动,重点考察他们在当时一系列政治事件中的表现及其与当时重要政治人物的关系,试图对其一生作出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对令狐楚所谓的党属问题及令狐绹在牛李党争中的是非曲直作出较为公正和合乎实际的评判,并揭示出一些政治事件的幕后真相。

例如,围绕令狐楚所谓的党属问题,历来在认识上均存在偏差。如前所言,史家、学者长期以来多视令狐楚为牛党,这种说法在李商隐研究中影响颇大。这一说法或基于《旧唐书·李商隐传》的记载:“(李)德裕与李宗闵、杨嗣复、令狐楚大相仇怨。”或基于令狐楚与李逢吉的关系。然《旧唐书·李商隐传》的记载本身就失实,据本谱,令狐楚除宝历二年在宣武节度使任上因未加核实,奏亳州出圣水,饮者疾愈,为时任浙西观察使的李德裕上疏言其事妄,请加禁止外,两人之间并无任何恩怨可言,令狐楚与牛党成员之间亦未见有任何往来。《李德裕年谱》“大和

六年”下也说令狐楚“并无依附李宗闵、牛僧孺而求进的行迹”，“开成二年”十一月下亦云：“按令狐楚于敬宗后期起历任方镇，已不参与朝中派系斗争，与牛僧孺、李宗闵似亦无甚往来。”文宗朝牛、李两党交替执政，相互倾轧，而令狐楚却都能得到升迁，这现象本身就足以显示其脱身于牛、李党争之外的政治立场。视令狐楚为牛党的另一个依据就是令狐楚与李逢吉的密切关系，因为一些学者认为李逢吉属牛党，如冯浩《玉溪生年谱》“大中十二年”下云：“楚虽与李逢吉善，然元和进用，自由皇甫湜、萧俛，岂尽关牛党哉？”王炎平先生《牛李党争》更指出李逢吉为反对削藩而结党乱政，是为党争之始，他是牛党的第一党魁，《李德裕年谱》虽然没有明确说李逢吉是牛党，然谱中多处暗示了其于牛党之间的密切关系，如序中说：“李逢吉正是李宗闵、牛僧孺等人早期的庇护者”，“大和五年”谱云：“自李宗闵、牛僧孺执政，李逢吉的政治地位逐步得到改善。”但对李逢吉牛党之说，学界多有否定者，如何灿浩《李逢吉党属小考》^①提出李逢吉既不属于李党，也不属于牛党，自成一党；丁鼎《李逢吉与牛僧孺关系考论——兼论牛、李两党的划分标准》^②、《牛僧孺年谱》通过鉴别考察《旧唐书》李德裕传、李绅传等有关文献记载，并综合考察分析了李逢吉在党争中对牛、李两党双方的态度和立场，也得出李逢吉与牛僧孺并非同党的结论。既然李逢吉自成一党，令狐楚与其又关系密切，是否可以推断令狐楚属于李逢吉党呢？恐亦不能轻易下此结论。令狐楚与李逢吉虽然关系确实较为密切，两人中进士前就同居太原，有诗歌唱和往来，后来元和、长庆朝李逢吉又数有援引令狐楚之举，但令狐楚参与李逢吉

① 载《宁波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

② 载《人文杂志》1993年第3期。

与他人之间的政治斗争,仅元和十二年借起草裴度彰义军节度使制书之机反对裴度淮西用兵一事,穆宗、敬宗朝李逢吉的党争活动如打击元稹、李绅、裴度,均与令狐楚无涉。令狐楚的政治生涯,与其诗友白居易颇有类似之处,以元和十五年被贬为界,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在朝,与当时政治斗争联系较为紧密,先与挚友李逢吉联合反对淮西用兵,后依附同年皇甫湜,有中伤武儒衡之举,又与同年皇甫湜、萧俛相互援引,后期则绝大部分时间都离朝外任,脱身于当时党争之外,直到大和九年“甘露之变”爆发,才又被卷入朝士与宦官之间的斗争。

中晚唐政治颇为复杂,党派之争中往往交织着宦官、皇帝等因素在内,党派内部也存在权力之争。另外,由于牛李两党的相互诬陷、炮制(如《牛羊日历》、《周秦行纪》等),加上后世修史者人为地带着党争的眼光来看待当时史实,这样就造成牛李党争史料真伪互见,不仅对李党如此(《李德裕年谱》已多指出),对牛党亦多不实之词。因此围绕令狐绹的政治活动和交游,同样存在一些不正确认识。如牛党领袖李宗闵之子李璠入充翰林学士本在咸通四年,亦与令狐绹无关,修两《唐书》者却因为戴着党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李璠入充翰林这件史实,所以人为地认为是令狐绹大中朝执政期间所擢,即为一例。

三、重点考察了谱主诗文创作和生平著述的流传存佚情况。

令狐楚、令狐绹身后均曾有文集传世,特别是令狐楚,还是唐代的高产作家,但他们的作品后世散佚非常严重。本谱除对现存作品详加甄别外,还从方志、金石、笔记等广泛搜辑佚诗佚文,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复原谱主生前创作情况。对存世作品及可考知的佚作,凡能考定年代者均一一系年。对谱主一生著述的流传存佚情况,本谱亦据古今书目等加以了详考。

通过本年谱,笔者力图达成对令狐楚、令狐绹生平及创作较为全面客观的认识,纠正前贤与时人著述中相关疏误,为进一步研究中晚唐文学与政治提供一些可靠的依据。至于目的达到与否,有待读者诸君的检验。